

# 历代乾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李世忠

(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以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为吟咏对象的乾陵诗, 是中国古代帝陵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艺术及史学价值不可低估。历代乾陵诗多集中于评论武则天功过是非, 作者群体则名流云集, 既有陕西关中本地文人, 更有历代任职关陕或路过乾陵的著名学者、官员。乾陵诗为今人了解乾陵陵园在后代的植被保护情况、陵园建筑、石刻存在状态等, 提供了珍贵史料。

**关键词:** 武则天; 乾陵; 诗

**中图分类号:** I2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4-0086-05

##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Qianlin Poetry in Past Dynasties

LI Shi-zhong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e Qianling poetry, the chant to the multi-burial mausoleum of Emperor Gaozong of Tang dynasty and Empress Wu Zeti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ancient mausoleum. Therefore its artistic value and historical valu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Concentrated mostly in the criticism of the contribution and fault of Wu Zetian, the Qianling poetry was attributed to a variety of celebrities including native literati of Guanzhong, Shaanxi,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nd officials who served here or passed by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 Qianlin poetry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later history of the plant protection, the cemetery architecture and the existent stone carving in Qian Mausoleum.

**Key words:** Wu Zetian; Qian Mausoleum; poetry

中国古代帝陵被文人吟咏最多者,莫过乾陵。文学世界中的乾陵诗,不仅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且其记载的关于陵墓本身的历史信息,亦弥足珍贵。那么,历代文人所作乾陵诗是怎样吟咏乾陵的,这个作者群体有何特点?乾陵诗于今人了解乾陵的沧桑变化有何价值?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 一、乾陵诗的主题

乾陵虽为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然乾陵诗的主要吟咏对象却是武则天。围绕对武则天及其相关人物历史功过的议论,历代乾陵诗形成了独

特的创作主题。

历代乾陵诗最集中的主题,是对武则天的批评。《新唐书·则天皇后》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sup>[1]81</sup>。由此知武则天一生参与、掌控朝政的时间,实际长达半个世纪。在历代多数乾陵诗作者笔下,她以周代唐的“革命”与滥杀无辜,以及“秽乱”的后宫私生活,都受到了批评。如金代杨慤,明代马文升、李楠、卓玄应、杨邦宪等所作乾陵诗,均对武则天政治僭越行为予以尖刻讽刺。杨诗直斥:“牝鸡一啄血波流,天下何缘不姓周?今日阿婆心力尽,乾陵秃似老僧头”<sup>[2]2199</sup>;马诗抨击其“雀入凤巢”:“雀入凤巢彝道

**收稿日期:** 2014-03-12

**作者简介:** 李世忠(1987-),男,陕西渭南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鼓,阴乘阳位大伦轻”<sup>[3]</sup>;李楠则以“祸水”、“秽青编”等字眼批评武则天:“则天遗事秽青编,废帝临朝二十年”,“乾纲尽自垂帘落,祸水原从问寝来”<sup>[3]</sup>。甚至乾陵立无字碑,在乾陵诗作者眼里也是武则天自悔平生僭越行为之实证。如程帆《乾陵》:“秽德不堪书,空碑夕阳道。岂是汉文陵?何如随秋草”<sup>[3]</sup>。范文光《首夏上乾陵》:“妬风腥草木,妖气染熊羆。自丑生前事,难题石上辞”<sup>[3]</sup>。

批评武则天滥杀无辜及“秽乱春宫”者,如杜诗《乾陵四首》之一(其四?):“唐室将倾不可支,庐陵帝子一丝危。二妃骨醉诸王鸩,罄竹难书没字碑”<sup>[3]</sup>;杨邦宪《乾陵吊古四绝》:“试问当年狐媚者,徒留秽骨播人传”<sup>[3]</sup>。杨美益《乾陵三咏》:“笑杀莲花似六郎,含元殿里映宸妆。但誇兄弟承恩宠,漂泊谁怜帝在房”<sup>[3]</sup>。这些诗,或刺其滥杀之无道,或讽其侍奉两代帝王又狎昵男宠之可恨,或嘲笑其被诸侯讨伐之必然等,均情怀愤激。

武则天去世后,是否祔葬乾陵,朝廷有争议。武三思等主合葬,严善思等反对<sup>[4]2704</sup>。这种争议,也进入了后代乾陵诗的题材领域。洪圣翼、毕懋康同名诗《乾陵》,汝阳书《过乾陵》等,即于此发论。洪诗称武则天为“妖尼”,言其祔葬乾陵为“彰秽”<sup>[3]</sup>;毕诗以否定其人其事,言自己甚至不忍阅览乾陵碑文<sup>[3]</sup>;汝诗于(对)武则天的卑视之情更溢于言表:“马踏乾陵一笑过,盘旋十里势嵯峨。深藏是个贻秽远,试问芳名掩得么”<sup>[3]</sup>。

相比之下,褒扬武则天的声音相对较小。褒之者,主要是赞扬武则天爱重人才及其卓异的治国才能。如清程应权《乾陵》从比较的视角,以其治国之绩立论,认为历史上女性垂帘听政者不少,然像武则天这样作用“卓卓”者少有,其政治才华即使所谓“英主”也未必能做到<sup>[5]</sup>;王庆澜《乾陵》称武则天“宇宙创奇局,今古竟无匹”的前无古人,称赞她“能用狄梁公”、“更喜独怜才,弗怒宾王檄”的爱才惜才品德<sup>[5]</sup>;刘仲游《乾陵》赞武则天“聪明终悟梁公谏,宗庙礼仪无祔姑”的明达事理<sup>[3]</sup>;也有人虽批评武则天,但并不否定其才华。如杨殿元《乾陵》:“妖魂兀自饶才具,风雨犹能窃帝权”<sup>[5]</sup>。更有如赵翼这样的著名史学家,认为称武则天为英雄理所应当:“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sup>[6]929</sup>。

除议论武则天外,评论与武则天相关的其他历史人物,如褚遂良、狄仁杰、唐高宗等,也是乾陵诗重要主题。

首先是对武则天反对者褚遂良的议论。褚以反对武则天立皇后而被贬死于外,他的忠于朝廷被乾陵诗作者或赞美、或同情。如刘仲游《乾陵》则为他还笏遭贬的不幸“空悲”<sup>[3]</sup>。

其次是对武后朝名相狄仁杰的赞美。狄仁杰乃武则天并州同乡,深得武后赏识信任,大唐复国,狄相功不可没。如傅振商《经乾陵》:“一杯女主收前局,终数梁公擅胜场”<sup>[3]</sup>。李楠《登乾陵》:“梦回鸚鹄缘谁悟,环赐庐陵赖相贤”<sup>[3]</sup>。都于其尽忠竭诚及力挽狂澜之功予以高度礼赞。

对唐高宗,历代乾陵诗则批评得甚为严厉。如杜诗《乾陵》:“怪得满朝男事女,高宗原是妇人冠”<sup>[3]</sup>。胡文炳《乾陵七律》:“高宗总属昏庸辈,贞观究无法则遗”<sup>[7]</sup>。作者不仅批评高宗之昏庸无能,甚至连高宗之父太宗也一并指责。

## 二、乾陵诗的作者

乾陵诗作者,以所属朝代言,宋金少,明清多。尤值得注意者:唐本朝文人于乾陵完全采取回避态度,全唐诗中竟无一首咏乾陵之诗,而昭陵、定陵、桥陵等其他唐陵,却都有唐人涉笔<sup>[8]</sup>。如杜甫咏昭陵的诗就不止一篇,其咏桥陵,一口气作“三十韵”,独于乾陵,只字未提。大概褒贬乾陵陵主,于唐人本就十分纠结。

以历代乾陵诗作者是非武则天功过的态度言,这个群体又可分两类:凡汉人当政时代的作者,于陵主武则天多持批评态度,今存明代乾陵诗无一首肯定武则天者即可见;而少数民族当政的时代,武则天所获赞扬则较多。如金、清两代乾陵诗,于武则天就基本持肯定态度。由此可见,乾陵诗的创作某种程度上,已深深打上了时代政治文化的烙印。

以乾陵诗作者籍贯言,任职于关陕之地或路过乾陵而游览之的外籍官员,是乾陵诗创作主体。这个群体除普遍能作诗外,有的对历史古迹亦极感兴趣,有的则在当代政坛十分活跃。

如今存乾陵诗最早作者、北宋“政和间为郡幕,喜于诗翰”的宋京<sup>[9]1108</sup>,就是一位对历史古迹颇感兴趣的诗人。南宋人袁说友编《成都文类》,收宋京作《题司马相如琴台》《玉局》《武担》等诗篇<sup>[10]</sup>,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亦收有其咏成都杜甫草堂诗<sup>[11]2271</sup>。又如金代诗人刘仲游,《陕西通志》载其曾任坊州知州,清编《御选宋金元四朝诗·御选金诗》载其曾“官京兆同尹”。他也是一位关中古蹟爱好者,清李光映撰《金石

文考略》卷十五载其“明昌甲寅”(金章宗五年, 1195年)曾于兴庆池题名。清编《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五十二录其诗四首, 全为咏关中古迹者<sup>[12]</sup>。其他乾陵诗作者, 如曾出任陕西巡抚的明人郭登庸, 一生好学、手不释卷, 行迹所到辄有题咏; 明崇祯四年出任乾州知州的四川安岳县人杨殿元, 自称曾“数驱马梁山之下”<sup>[5]</sup>, 在寇乱民器的时代, 他不仅主持修纂了至今也是乾州方志中珍本的六卷本《乾州志》, 又于乾州古迹如狄仁杰墓、著名的窦氏二女祠等题留诗作。

乾陵诗作者中, 活跃于当时政坛、文坛, 且声名显赫者亦不乏其人。如一生“历五朝, 官六卿”, 前后主盟文坛四十年的金代学者、诗人赵秉文; 元末明初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刘基; 一生政绩显著, 有“五朝元老”之称的马文升; 明代复古派前七子领袖人物的李梦阳; 明万历年间一代名臣、官声显赫于世的李楠; 出身“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 以开罪魏忠贤遭罢官而被人们誉为“海内直臣”的山东滨州人杜诗。另外, 堪称明王朝忠臣烈士的练国事、范文光诸人, 亦名列其中。练国事明末巡抚陕西, 曾督军围剿农民起义; 范文光明末“曾振铎邠州, 惟以忠孝节义训邠士”<sup>[15]</sup>, 明亡, 作绝命词, 仰药而死。另外, 清散文家、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自号“随园主人”的袁枚, 及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的史学家赵翼, 也都参与了乾陵诗创作。这些名家的介入, 不仅提升了乾陵诗创作的艺术水准, 也极大提高了乾陵的文化知名度。

关中本地属籍的乾陵诗作者, 虽官声、政声不一定显赫, 然这些人在当地文化圈, 亦非等闲之辈。如乾陵诗作者、乾州人吴玉, 《民国乾县新志》谓其“天资英迈, 诗古文制艺, 皆有研究。三荐棘闱不售, 遂绝意进取。”其平生不仅见义勇为, 且热心教育。乾州历史上著名的乾阳书院, 即为吴玉于嘉靖初所创修; 又如留诗六百多首而宦业不达的清三原县人温自知, 刘绍攸纂修《乾隆三原县志》谓朝那(今属甘肃)总督杨鹤延赏其才, “延为上客, 欲以军功上太常, 坚辞”, 康熙元年(1662)知县林逊开修志馆, 曾邀其主纂; 又如早年常往来三原、乾阳间, 不屑意举子业的清三原人杨秀芝, 一生遇佳山水, 辄独往, 存诗竟多达六千余首; 其他如明李应聘、王完, 清梁文典等这些乾陵诗作者, 都或以宦声治绩、或以举业文名, 而为乾州当地一代乡贤名人。

相较之下, 关中作者的乾陵诗, 于武则天的态度较为和缓, 严厉批评者不多。这些人的参与, 表明乾陵所在地学者文人, 在论定武则天历史地位的过程中并没有缺位。而且也正因他们的参与, 文学中的乾陵诗, 才终能成为一种承载地方文化的艺术形式而富有独特魅力。

### 三、乾陵诗的史学价值

乾陵诗除议论陵主武则天及相关人物之外, 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描写乾陵景观。这些写景笔墨, 为今人了解乾陵在历史上的存在状态, 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首先, 乾陵诗记录了历代乾陵陵园植被的保护状况。

汉唐时期, 关中帝陵植被保护严格。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后集》卷十五录《三辅旧事》语云: “汉诸陵皆属太常, 不属郡县, 有人盗柏者, 弃市”<sup>[16]</sup>。唐高宗武后时朝, 有人误砍昭陵柏树, 皇帝甚至亲自下令“以一柏杀二将军”, 狄仁杰有《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为之辩<sup>[17][1728]</sup>。五代时期, 陵墓封树之有无, 甚至被提到“名教”高度来看待, 郭威《新丧未葬不准选举诏》云: “古者立封树之制, 定丧葬之期, 著在典经, 是为名教”<sup>[17][330]</sup>。因为保护措施到位, 故关中帝陵, 尤其唐陵植被, 在唐亡后一度保护完好之状可知。

以乾陵言, 至少北宋徽宗时, 其陵园树木还保护得相当不错。然经宋金战乱, 至南宋末, 乾陵树木几乎毁灭一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登进士第的赵秉文《过乾陵》诗小序云: “乾陵, 故梁山也, 旧有柏万株, 亡矣”<sup>[2][1310]</sup>。他的乾陵诗留下了“故山草木赭, 应悔复辟迟”之句; 至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及进士第的杨髓, 其《乾陵》诗描绘此地童山秃岭景象, 竟以“乾陵秃似老僧头”来比喻。

明代, 乾陵陵园的荒残景象不仅无改观, 反有进一步加剧态势。明景泰二年(1451)进士及第的马文升, 他的咏乾陵诗既说“禁垣有趾荒秋草”, 又说“独有数行翁仲在, 夕阳常伴野农耕”。如此, 乾陵植被尽毁之象可知。

明中后期, 乾陵植被命运进一步恶化。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的杨巍, 其《乾陵》诗这样写道: “毒雾生阴壑, 悲风吹旷野。残烧无人收, 山高土色赭。……柏生根亦无, 泉涸水不泻”<sup>[18]</sup>。毒雾四起, 陵区燃过的馀烬无人收拾, 山陵岩土裸露, 一片赤赭之色。这种荒残景象,

在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麻城人陈楚产笔下,依然如故:“西来立马望荒坟,惆怅难胜万古情。断碑欲随衰草没,牝鸡不似昔年鸣。”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及第的尹伸,其《和乾陵壁上作》也说乾陵陵区“荒原落日草凄然”,直至万历末进士杨邦宪,其描绘乾陵仍是“秋风零乱淡寒烟,苔没残碑草色芊”。

乾陵树木遭致如此破坏,原因是什么呢?明陈耀文撰《天中记》作了回答。

《本草经》曰,乾陵之柏异于他处,其木未有无文理者,而其文多为菩萨、云气、人物、鸟兽状,极分明可见。有盗一株径尺者,可值万钱,关陕人家多以为贵,宜其子实最佳也<sup>[19]</sup>。

从明人的乾陵诗中,不仅可以看到陵园树林完全被扫荡、毁灭,甚至陵区土地,也全变成农田。明王云凤《乾陵》说:“发余陵上石纵横,陵下闲田亦尽耕。独有穹碑高入望,行人下马阅题名”<sup>[20]</sup>。

清初,朝廷曾下令保护前代陵墓。《民国乾县新志》:“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处,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顷九十八亩六分,分与陵户耕种,不知何年拨二十亩为狄梁公墓地租。”因有人管护,乾陵陵园植被一度似有恢复。这个情况从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赠粮储道步公》诗可见:“临湘家世拥旌旄,策马西来剑佩高。华岳风云开间气,乾陵草木壮神皋”<sup>[21]</sup>。诗云草木“壮神皋”,则乾陵植被有所恢复之状可知。另外,康熙元年(1662)后去世的乾州人温自知,也在其诗中传递了这方面信息:“我今登其巅,萧萧风怒来。饥鸢猎旷野,寒狐叫山隈”<sup>[5]</sup>。有饥鸢这样的猛禽翱翔、觅猎于旷野,更有“寒狐”出没,说明乾陵周围植被已较大程度得到了恢复。

但到了康熙九年(1670)进士及第的许孙荃《无字碑题诗》中,乾陵不仅“台殿焚烧石兽崩”,且“满野牛羊春草齐”<sup>[5]</sup>,完全成了牧场。这大概是因乾陵没有被朝廷列入“祭告”之陵,故植被的恢复与破坏在同时进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清末。

其次,乾陵诗也为后人了解陵园建筑及石刻保存情况,提供了珍贵信息。

史载,乾陵整体布局与唐长安城格局相似,原有内外两重城垣,分宫城、内城与外廓城。近年乾陵考古表明,文献记载的乾陵城垣分内外两层的情况确实存在。然今人在乾陵陵园里,已看不到古城垣痕迹。那么,历史上乾陵城垣遗址究

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湮灭的呢?

明初,乾陵陵园城墙遗址仍清晰可见,看不见痕迹的,仅是在战火中早已焚毁的陵园殿寝。明初马文升诗云“禁垣有趾荒秋草,殿寝无痕数到兵”<sup>[3]</sup>,禁垣有趾,说明这个遗址清晰可见。

明弘治、正德间,乾陵城垣遗迹也依然存在。弘治七年(1494)进士及第的李梦阳,在《乾陵歌》中称乾陵是“九重之城双阙峙”<sup>[5]</sup>,这也说明他确实看到了乾陵城垣遗迹。

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的杨巍仍然说:“当时信奢丽,遗址尚豁闻”<sup>[18]</sup>。凭借建筑遗址,他说游人可见当年乾陵是何等奢华壮丽!

乾陵城垣遗址甚至直到明末,也还可以看到。崇祯时期,任职陕西的杨殿元《乾陵》诗有句:

“重城双阙拥高封,跛马残螭处处逢”<sup>[5]</sup>。双阙,指陵园的两组双阙楼;“重城”,自然也是其亲眼所见古城之双重城垣之遗迹。这个情况从他所撰《乾县志》序言中也可得到印证,其志序云:“伪周武氏者,重城雕石,寂无声灵”。可见,诗言“重城”全为写实。

清以后的咏乾陵诗,就再不见有写乾陵城垣遗址的文字了。所以,今人看不到乾陵双重城垣遗址,要问它何时湮灭?当是在清代。

另,乾陵阙楼,上述咏乾陵诗已有涉及,其在明代也基本是完好的。明嘉靖间乾州人王子直(王子直父为嘉靖五年进士)《登乾陵》云:“述圣碑残横绿草,双龙阙古入青冥”<sup>[3]</sup>。至万历末进士杨邦宪咏乾陵,还说“双阙巍巍耸具瞻”,可见乾陵南二峰阙楼在明代后期还颇具雄姿。到了清嘉庆、道光时期,乾陵阙楼就风光不再了。嘉庆十三年(1808)岁贡生吴玉《晚过乾陵》云:“雨过高原净,落日荒陵道。暮气骄石马,长风撼坏堡。鬼燐乱明灭,翁仲纷颠倒”<sup>[5]</sup>。乾陵诗也记录了乾陵翁仲的损毁进程。

乾陵翁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六十一蕃王像。这些蕃王像北宋元祐间仍保存完好。从北宋人游师雄所绘《唐高宗乾陵图》并赵楷《乾陵图说》知:乾陵献殿门前有高一丈二尺石狮子一对,“左蕃酋29人,右蕃酋32人。蕃酋高七尺”<sup>[7]</sup>。石人背刻各人姓名。游师雄还为之刻四碑,每碑十六人,“各写其衣冠形迹,及其名爵,其不知者阙之”,游师雄“按部过乾陵”,“录高宗天后时朝臣六十人,重图于陵所”<sup>[7]</sup>。这说明当时不仅石刻,甚至乾陵壁画也有保存。至南宋末,乾陵六十一蕃王像也还整整齐齐、排列有序。金赵秉文《过乾陵》

诗小序云：“(乾陵)有石蕃王像，来朝者六十四，至今犹存。”其诗云：“晓日上乾陵，乾陵何巍巍。前瞻对双阙，上有十丈碑。左右蕃夷像，想见朝贡时”<sup>[2][13]10</sup>。

明初，乾陵诸蕃王像仍层层峻立卫护着陵园。明开国功臣刘基《乾陵》：“蕃王严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sup>[3]</sup>。此景明初马文升也有描写：“独有数行翁仲在，夕阳常伴野农耕”，既言“在”，且“常伴野农耕”，则这些翁仲至少是完整的（未被砍头）。

但是这个情况到明中期发生了变化。弘治间进士李梦阳《乾陵歌》称乾陵无字碑“突兀云霄里”，然翁仲却遭严重破坏：“相传瓮仲化作精，黄昏山下人不行。蹂人田禾食牛豕，强弩射之妖亦死。至今剥落临道旁，大者虎马小者羊”<sup>[5]</sup>。此诗未确写蕃王像是否砍头，而只说石虎马、石蕃王像倒地或被砍头情形。今人解释乾陵蕃王像无头之因，一个说法即传其成精毁坏庄稼故被砍头，李诗印证了这种说法。同时从此诗亦可知，乾陵六十一蕃王像即使在当时还未被砍头，那它们的境遇也至少是很危险了。李梦阳为官主要在弘治、正德间，以其诗判断，六十一蕃王像之被破坏，

至少也是发生在明弘治、正德前后，而不会晚至清末。

明嘉靖时期，乾陵石刻之损毁已十分严重。明章潢在其所撰《图书编》中录胡松《与乡中知旧书》语云：“……出乾西北数里，经乾陵，则天葬处也，所遗石翁仲人物，杂卧土石草树间，甚巨且众，则当其盛时，雄丽可想”<sup>[22]</sup>。胡松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前后在世，他看到的倒地石人，应该也包括那些蕃王石像。另，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总督陕西三边的魏槐川，及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及第的杨巍，都言及乾陵翁仲。魏诗云“双阙拂云枢接天，兽埋碑断草芊芊”<sup>[3]</sup>；杨诗云“蔓草缠翁仲，积沙没石马。突兀七层碑，字蚀诘堪打”<sup>[18]</sup>。所谓乾陵翁仲被蔓草裹挟，沉积的沙石半湮石马，述圣碑字迹斑驳，风化严重已经不起拍打。这个情形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的杨美益在乾陵看到的“断首空碑卧草坪，荒茵落日到麒麟”情形相似。至明末，范文光咏乾陵诗，已不言乾陵翁仲，而只说乾陵陵园“麦熟黄垂地，苔深绿绕碑”。如此，则翁仲仆倒、湮没于乱草可知。

###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 阎凤梧, 康金声. 全辽金诗[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 [3] 拜斯呼朗. 乾州新志[M]. 雍正五年刊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 [4] (唐) 严善思. 论则天不宜合葬乾陵表. 董诰. 全唐文: 卷二六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周铭旂. 光绪乾州志稿[M]. 光绪十年乾阳书院刻本.
- [6] 华夫. 赵翼诗编年全集[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 [7] 范凝绩. 民国乾县新志[M]. 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
- [8] 李世忠. 唐代咏陵诗及其史学价值[M]. 北方论丛, 2011(6): .
- [9] (宋) 祝穆. 方輿胜览·资州·名宦: 卷六三[M]. 施和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0] (宋) 袁说友. 成都文类[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清)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2] 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3] (清) 张延福. 泾州志·艺文: 下卷[M]. 乾隆十八年抄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 [14] (清) 李培谦. 阳曲县志[M]. 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 [15] 曹骥观.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M]. 民国二十四年(1935) .
- [16] (宋) 陈景沂. 全芳备祖后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7] (清)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8] (明) 杨巍. 存家诗稿[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9] (明) 陈耀文. 天中记: 卷五一[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0] (明) 曹学佺. 石仓历代诗选[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1] (清) 吴伟业. 梅村集: 卷十一[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2] (明) 章潢. 图书编: 卷三八[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